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学术著作基金资助出版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与中国共产党的
关系研究**

任晓伟 著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
任晓伟 著.—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2
ISBN 978-7-224-10200-0

I. ①欧… II. ①任… III. ①中国共产党—关系—欧洲—共产党—研究 IV. ①D2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092549号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 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研究

作 者: 任晓伟
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 陕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西安北大街147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正华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6开 12.75印张 2插页
字 数: 174千字
版 次: 2012年6月第1版 2012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24-10200-0
定 价: 26.00元

目 录

MULU

绪 论 / 1

第一章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主要活动 / 11

- 一、“二战”结束初期的美苏关系 / 12
- 二、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主要活动 / 24
- 三、中国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最初反应 / 33

第二章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 / 39

- 一、从七大到抗战结束前夕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发展的战略构想 / 40
- 二、《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与斯大林的电报 / 43
- 三、毛泽东对《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认识与重庆谈判的源起 / 48
- 四、关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 / 55

第三章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源起 / 60

- 一、美苏合作与联苏防美:1945年4月至8月 / 60
- 二、美苏妥协与以夷制夷:1945年8月至1946年4月 / 62
- 三、中间地带与独立自主:1946年4月至1947年12月 / 65
- 四、“两个阵营”与“一边倒”:1947年12月至1949年6月 / 68

第四章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 / 79

- 一、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构建及其体制特征 / 81
- 二、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两个阵营”的理论改变了维系新民主主义社



会理论的国际政治环境 / 88

三、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民族主义的批判压缩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存在的意识形态空间 / 91

四、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苏联模式的强化提供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替代模式 / 103

五、新民主主义社会主要矛盾与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在中国的确立 / 111

第五章 中国共产党摆脱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两个阵营”理论的探索 / 125

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对“两个阵营”理论的突破 / 126

二、新“中间地带”理论：对“社会主义阵营”论的质疑 / 131

三、“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和 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外交理论的现实主义 / 134

四、“三个世界”划分思想的发展 / 138

第六章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与中国共产党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早期探索 / 143

一、苏共二十大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 / 143

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与毛泽东反思苏联模式的开端 / 150

三、毛泽东对改革苏联模式的认识演进：从《论十大关系》到《正处》 / 154

四、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识反复：从《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到“九评” / 163

五、从对社会主义改革的曲折探索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兴起 / 176

结 语 / 181

主要参考文献 / 188

后 记 / 198

绪论

XULUN

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本书下面统一简称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是1947年9月在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推动下成立的一个特殊国际机构,最初的成员党有波兰、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匈牙利、法国、意大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苏联等九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1948年后,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开除,此后一直到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宣布解散,只有八个成员党。尽管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这一机构在当时就有“小共产国际”、“共产国际的复活”^①之称,时至今日依然有人把它称作“共产国际的缩减版本”^②,但在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马克思主义组织史上,人们一般情况下并不把它与1864—1876年的国际工人协会(第一国际)、1889—1914年的国际社会主义者代表大会(第二国际)以及1919—1943年的共产国际(第三国际)相提并论。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虽然是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名义下建立和开展活动的,但其实质却在于它是适应冷战环境下苏联对美国的外交战略和自身国家利益需要所产生的一个区域性政治组织,是苏联捍卫和延伸自身安全利益的一个特殊机构,也是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在战后控制欧洲社会主义运动和扩张苏

^① Barghoorn, Frederick C., What Russian Think of Americans, Foreign Affairs, 1948, Vol. 26, Issue 2, p. 290.

^② [英]唐纳德·萨松:《欧洲社会主义百年史》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118页。



联社会主义模式的一个工具。另外,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成员党,无论是初建时的九个,还是后来的八个,都是欧洲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并没有扩大其成员党的范围,其成员党的地域性特点是非常鲜明的。因此,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国际性程度和历史成就是远远无法与前面的三个国际组织相比的。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存在的时间并不长,从1947年9月建立到1956年4月解散,只有不到九年的时间,而实际上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活动了,这样算起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存在其实只有五年多的时间。在许多人直观的印象中,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这五年多的时间里似乎并没有什么建树,唯一的“建树”就是大张旗鼓、一而再地、再而三地猛烈批判铁托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这给人们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许多人提起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马上能够想到的就是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把南斯拉夫开除了社会主义大家庭,想到苏南冲突。当斯大林去世后,苏联主动承认这一错误,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平了反”,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自己否定了自己的这一“建树”后,似乎再没有留下什么“成绩”。但是,这其实是人们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历史作用的一种误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存在和活动的五年多时间,是战后世界政治发展非常关键的时期,是苏联根据自身的利益需要牢牢控制住东欧国家或者说东欧国家“苏联模式化”的时期,也是深刻影响新中国成立前后国际政治理念和发展模式抉择的时期。因此,在对战后国际政治、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以及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建国构想的研究中,不能忽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这一特殊机构所起的复杂、隐晦但又至关重要的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学者开始从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教训的层面开始了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研究。曹长盛等人在《国际政治研究》1981年第1期发表的《论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主要教训》,可以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国理论界较早地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研究的学术论文。该文认为,在社会主义运动中处理党与党的关系、各国党坚持独立自主、任何党不能把自己的经验强加到别的党的身上等方面,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留下了许多的历史教训。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后,随着冷战史研究的深入

以及一些重要档案文献资料的汇编整理,我国理论界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研究进一步深入。孙岩发表于《中共党史研究》1994年第1期上的《中国共产党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系初探》一文,主要是梳理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从冷淡回避、拉压结合到重视和改善的转变,并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为了顾全大局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支持,其不足在于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内在影响的分析不够,即是说,没有研究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时代和社会主义认识变化的影响。高敬增发表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上的《试论九国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功过和经验教训》一文认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分析战后世界发展形势、团结欧洲工人阶级、指导社会主义运动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等方面有其历史功绩,但在践踏共产党之间的独立自主、压制南斯拉夫探索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推动东欧党内的政治清洗等方面犯了严重的错误。但该文在研究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历史作用的同时,并没有涉及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问题。此外,还有一些专题介绍性的成果,比如冯健《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载张友伦等:《共产主义运动的五个国际组织》,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主要是分析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的背景和活动,重点是介绍苏南关系。孙耀文的《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是国内关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其中也专门研究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认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是新中国成立后导致毛泽东快速中止新民主主义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一著作提出这一问题,具有重要的学术和理论意义,但分析和认识尚需要进一步深化。张盛发著《斯大林与冷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也涉及冷战环境中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作用,但没有对这一作用做深入的研究。沈志华的《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及其目标》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章百家、牛军编:《冷战与中国》,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1—50页)是近些年关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研究的一个重要成果,该文利用大量的文献档案研究了苏联推动建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政治目标、具体过程以及在苏联外交战略需要的限制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行为界限,但该



文并没有研究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和新中国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薛衔天、李福生在《中共党史研究》2004年第1期上发表的《关于中共批判南共民族主义问题》一文、杨奎松《“中间地带”的革命——国际大背景下看中共成功之道》（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一书都研究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第二次代表会议后对南斯拉夫民族主义的批判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特别是在意识形态这个层面的影响，但却没有更进一步提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史这个研究课题。魏鹏在《临沂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5期发表的《从情报局的建立看前苏联的阵营对抗战略》以及吕雪峰在《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8年第6期发表的《论苏联对东欧政策的输出机制——对共产党情报局成立会议的考察》，都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苏东关系，既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整体活动缺少研究，又忽视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一问题。当然，虽也有学者提到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在关系问题，但却存在明显不同的观点。比如，党史学家冯蕙认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批判南斯拉夫民族主义、反苏和亲资本主义的活动，是致使中共建国前后改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毛泽东思想这两个概念的重要原因^①。党史学家鲁振祥则认为，被称作“民族主义分子”的压力在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而且中共也感觉到了这种压力，但这种压力对于中共的理论和实践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事实表明，中共主张搞新民主主义也好，主张立即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也好，都是独立自主作出的决策，跟所谓‘民族主义问题’的压力无关。”^②但无论上述哪一种观点，都还需要在对档案资料进一步系统梳理的基础上进行全面的思考。

在国外学者的研究中，最有代表性的论著是西班牙共产党前总书记费尔南多·克劳丁1969年所著《共产主义运动——从共产国际到共产党情报局》一书，该书详细研究了从1919年共产国际建立到1956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解散期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苏联革命战略和外交战略的转变，特别是斯大林控制下社会主义运动发展中一系列重大历史和理论。苏联解体后，一些俄国学者

① 冯蕙：《六届六中全会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1999年第2期。

② 鲁振祥：《史事追寻——中共思想史上若干问题》，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250页。

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也有一些重要研究,代表性的主要有吉比扬斯基《共产党情报局是怎样产生的》(译文载《当代世界》1994年第4—5期)、阿迪别科夫《莫洛托夫与1950—1951年改组情报局的尝试》(译文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2002年第2期)等。这些成果主要是利用苏联解体后新公布的历史档案,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产生及其存在过程中一些长期被隐瞒和不被注意的历史事实进行还原。另外,一些学者在对冷战史、战后苏东关系、苏南冲突、朝鲜战争以及在关于不同国家共产党历史的研究中^①,也比较多地涉及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研究和评价,但总的来看,近些年来,国外学者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本身缺少深入的研究^②,对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研究更是非常缺乏。

总体上看,目前关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研究是非常零散、时断时续,研究的系统性、全面性都还是非常不够的。目前,关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研究主要还是以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战后欧洲政治发展和欧洲政治格局变迁中的美苏关系为主,关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及其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刻影响,只有一些零散的研究,还没有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因此,在目前关于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和新中国早期发展史的研究中,人们基本上缺失了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所起作用的研究和观察,很多人只是在提到新中国成立前斯大林对毛泽东成为“亚洲的铁托”的担心时,才能联想到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所起的影响。另外,有人甚

① 可参见下列文献:WADA Haruki, "The Korean War, Stanlin's Policy, the Japan",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1998, Volume 1; Geoffrey Swain, "The Cominform; Tito's International?" The Historical Journal, 1992, Volume 35, Issue 03; Silvio Pons, "stalin and the European Communists After World War Two (1943 - 1948)", Past and Present, 2011, Supplemant 6; Vladimir O. Pechatnov,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World, The Cambrige History of Cold War, Volime 1. John O. Latrides, Revolution or Self Defence? Communist Goals, Strategy and Tactics in the Greek Civil War,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2005, Volume 7; Black, J. L., "The Stalinist Image of Canada: The Cominform and Soviet Press, 1947 - 1955", Labour / Le Travail, 1988, Vol. 21; Karl Hack, The Origins of Asian Cold War; Malaya 194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Volume 40. Harry A. Poeze, The Cold War in Indonesia 1948,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2009, Volume 40; Robert C. Tucker, The Cold War in Stalin's time: What the New Sources Reveal, Diplomatic History, 1997, Vol. 21, Issue 2.

② 有些关于社会主义历史的研究著作则根本没有提到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这一机构,比如,Donald E. Busky, Communism in History and Theory, Praeger, 2002.



至认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抱负极少”,对于战后的世界社会主义“并没有起多大作用”^①。其实,我们从时间来看,也没有理由忽略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在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集中活动的1947—1953年,这一时期恰恰是中国革命走向最后胜利和新中国开始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也是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关系史上非常微妙和复杂的时期。仅从这种时间的高度密合性来判断,也不能不重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这个因素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活动和新中国早期发展的重大影响。从历史事实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后,特别是从1948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布加勒斯特会议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理论上和政治上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是客观的,也是深刻的。如果脱离了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所起历史作用的认识,无论是东欧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初期的苏联模式化,还是新中国早期发展中的许多重大问题都是无法被深入理解的。

冷战背景下,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归结起来说,主要表现为“两个过程”,一个是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由远到近地影响中国共产党的过程,一个是中国共产党摆脱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影响和艰辛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过程。

第一个“过程”,主要是在1948年到1953年之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逐渐把自己的影响渗透在中国共产党对时代发展和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之中,而第二个“过程”则主要是在1956年之后的20年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1953年就基本上停止活动,1956年宣布解散。在此后20年的时间里,走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影响,实际上成为中国共产党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线索。这主要是因为,第一,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是苏联对美国进行冷战的组织工具和力量基础,虽然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作为一种特定的组织解散了,但冷战的大国政治主题仍然在延续。“冷战开始后的20年中,国际政治主要关心的是,如何适应美苏对抗的形势,以及如何局部地抵制这种美苏对抗。”^②从这个意义上说,虽然欧洲共

① [波兰]约·维尔钦斯基编:《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词典》,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191页。

②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63页。

产党情报局解散了,但20世纪50年代后的中国共产党人仍然要面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存在所标明的这个时代。第二,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既有观念层面的,也有发展模式层面的,这些都是长期持久性的因素。只要中国共产党人努力探索新的国际政治观念和社会主义发展模式,那么,事实上就是在客观上努力走出或者说摆脱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所曾施加的影响。

本书的目的在于利用目前的相关资料和文献,系统、全面地在冷战的背景下,研究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成立后,特别是1948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及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了摆脱这一影响所进行的艰辛探索,并从国际和国内、外交与内政、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等多重视角来深入研究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共产党国际政治理念的变迁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探索。这一成果的最终目的是在对历史研究的基础上,使人们能够进一步深入地认识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艰辛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历史真理性。

本书包括绪论、正文和结论三个部分,正文部分共分为六章,这些内容在问题的逻辑性上,彼此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内在关联着。

本书的基本逻辑框架和思路是:

绪论部分主要是对本书所研究问题的研究状况、研究内容和研究意义进行相关的说明,目的在于使人能够比较清楚地理解本书所研究的问题的历史背景、学术背景以及研究中的主要问题。

第一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主要活动。“二战”结束后,美苏关系中的对抗性因素不断增长,两国逐渐从战时同盟走向战后的冷战对抗。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是在苏美冷战的背景下适应苏联的外交需要,特别是苏联控制东欧国家和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需要而建立的一个特殊的国际机构,这一点也决定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政治行动的边界。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后,主要召开过三次会议,即1947年的波兰成立会议、1948年的布加勒斯特会议和1949年的匈牙利会议。1948年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主要的活动内容是批判南斯拉夫共产党的“民族主义”,这对战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后引起了中国的广泛关注,但“左派”知识分子和右派知识



分子对这一组织及其对中国影响的认识完全不同,而在1948年之前,中国共产党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态度则是非常谨慎的。

第二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前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策略。这一部分主要以《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后重庆谈判的源起这一抗战结束后关系中国革命走向的重大问题为核心,研究在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建立前,中国共产党对中国政治和革命发展道路的独立自主的认识和实践。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战后中国革命的过程中虽然不得不考虑和适应美苏关系的变化,但并没有使自己的斗争局限在或从属于美苏关系的范围之内,而是巧妙地利用美苏关系来捍卫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斗争策略。

第三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一边倒”外交战略的源起。这一部分主要以1945年到1949年毛泽东对美苏关系的认识演进为主线,研究中国共产党外交战略的调整和变化,力图从宏观上研究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关于战后世界政治发展判断和认识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1948年后随着欧洲共产党情报局逐渐开始加强了对中国革命的理论 and 政治影响,毛泽东改变了“中间地带”的认识,转而开始接受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尖锐对立的“两个阵营”理论的世界政治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这一方面反映出大国政治对像中国这样的落后国家的革命不可避免的重要影响,一方面也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新中国的国家安全和在国际上的生存而进行的艰难外交抉择。

第四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这一部分主要研究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20世纪40年代中期以后形成和不断发展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国理论的内在影响,着重阐述这一观点,即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政治和理论活动是改变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历史命运的一个重要因素。对“两个阵营”理论的接受和对批判南共民族主义的支持,以及受同一时期在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监督之下东欧国家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转型的影响,新中国建立后很快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历史命运的影响,是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最深层次的影响所在。从一定意义上说,向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

过渡,是在接受了“两个阵营”的国际政治理论后在国内发展模式抉择上的一个必然结果。

第五章:中国共产党摆脱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两个阵营”理论的探索。这一部分主要研究20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对国际政治认识的演进和新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经过从“和平共处”“新中间地带”理论到“三个世界”划分的艰辛探索,毛泽东最终以“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为标志,初步走出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关于战后“两个阵营”划分的冷战观念,为中国新的外交战略的提出、新的外交格局的开创以及新的社会主义发展模式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第六章: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解散与中国共产党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早期探索。这一部分主要以20世纪50年代后党的重要理论文献为主线,分析和研究毛泽东对摆脱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探索。苏共二十大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宣告解散,毛泽东开始积极探索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改革,并领导中国共产党在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成果。但在20世纪50年代后毛泽东对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早期探索中,存在着两条主线,一条是关于改革苏联模式的认识,一条是关于维护和强化苏联模式的认识。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念中,这两条认识主线往往是重叠交叉在一起的,而且,由于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认识的历史局限,越是往后,维护和强化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认识越是占有主导地位。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这种认识上的变化和反复,根本的原因在于毛泽东在摆脱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两个阵营”的观念后,没有能够实现时代发展主题判断的根本转换,由此仍然长期坚持在旧的时代观念下长期养成的从“革命和战争”“矛盾—形势—阶级斗争”的线索来认识社会主义的思维范式。这导致毛泽东最终没有能够成功地探索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没有能够走出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最深层次的影响。

在上述六章的基础上,结论部分主要是总结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在战后世界社会主义发展进程中的历史教训,并从时代观念和本国发展道路的探索这二者关系的角度来总结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经验,并着力强调这样一个观点:毛泽东的“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所蕴涵的新的国际政治



观念以及他对改革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努力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兴起、深入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此外,结论部分还提出了关于欧洲共产党情报局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一些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总之,在冷战的背景下,通过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这一视角,研究中国共产党对时代发展的认识和对中国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

首先,这一研究能够推动对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历史活动研究的深入,使人们能够更加深刻地认识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战后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

其次,这一研究能够深化对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共产党历史、理论和新中国早期发展中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比如新中国国际政治观的形成、“一边倒”外交战略的确立及其深层历史内涵、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历史命运、新中国发展模式的转型等;

再次,这一研究通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由来、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艰辛探索、时代观念与发展模式抉择二者的内在关系等问题的研究,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的整体背景下提升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早期历史探索的研究;

第四,这一研究对于从国际与国内、马克思主义的时代化和中国化相结合的角度总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经验有着重要的价值。

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和主要活动

“世界历史”意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征,这一点构成了社会主义运动历史进程中国际主义传统和无产阶级国际组织的理论基础。从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到列宁领导时期的第三国际,都体现了无产阶级寻求世界团结和国际联合的历史努力。不管今天看来这些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带有着怎样的历史不足,但它们所坚持的“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精神则是不容置疑的。相比之下,1947年9月,在苏联和斯大林控制下建立的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则是非常特殊的。作为一个特殊的国际组织机构,欧洲共产党情报局是“二战”结束前后美苏关系变化的产物,体现的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意识形态掩盖起来的尖锐对立的美苏大国利益冲突。虽然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主要适应的是美苏在欧洲的大国利益,但这一组织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在冷战的背景下,系统研究欧洲共产党情报局对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以及中国共产党为走出这一影响所进行的探索,对于深入认识“二战”后中国革命发展的特殊性、新中国建国的复杂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形成的艰巨性是非常重要的。



一、“二战”结束初期的美苏关系

1933年11月,面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扩张,美国放弃了自十月革命以来奉行了16年之久的对苏联不承认的外交政策,美苏国家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但两国关系正常化后仍然存在许多“不正常”的因素,并没有实现两国原初所预期的目标,一系列的矛盾冲突不断给两国关系降温^①,猜忌、互疑笼罩着苏联与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的关系。1939年3月,英国首相张伯伦在对法西斯主义侵略下欧洲政治走向的分析中明确地表达了对苏联的不信任:“我必须承认,对俄罗斯怀有非常深刻的怀疑。我认为即使它有心也无力于维持有效的攻势。我也不信任其动机。在我看来,苏联的动机与我国的自由观念毫无关联,而且一味只想挑拨离间。”^②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进程,很快推进了苏联与西方世界的关系。1941年6月,德国开始大举进攻苏联,苏德战争爆发,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美国军事基地,最终把美国拖进了战争之中,法西斯主义的侵略战争把美苏迅速推向了战略同盟关系。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美苏关系的正常化及其战时同盟关系的确立是20世纪世界发展的重要政治成果,也是影响此后整个世界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战”期间,美苏两国战时同盟关系的确立,特别是在1943年斯大林解散了共产国际之后,一度使许多人不再过多看重双方的意识形态分歧。1943年美国《生活》杂志在一篇文章中说,俄国人“长得像美国人,衣着像美国人,想法也像美国人。”1944年,《纽约时报》一篇文章论断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苏维埃俄国已经过时了。”^③不管这种想法事后看来多么天真,它客观上表明人们对美苏关系在战后的和平发展所寄予的希望,不过这种希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落空。“二战”期间,美苏在维持战时同盟关系的同时,双方的矛盾和斗争也在不断扩大。因此,还在1944年底,美国国内就有人在强调对苏联对立的政治思

① 桂立:《苏美关系7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52—58页。

②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页。

③ [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461页。